**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讲解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欢迎各位领导莅临长沙博物馆参观指导，我馆一共有6个展厅，展厅面积6000余平。我们首先要参观到的是《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

**序厅：**

长沙，一座因星辰得名的城市,山水洲城，塑造了其独特的个性和魅力;屈贾之乡,造就了长沙“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人文情怀。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亦如银河星汉，闪耀着璀璨光芒。

“长沙古代历史陈列”以时代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城市发展变迁、著名历史人物为纬，将向您展示长沙过去的辉煌。

在序厅部分，我们为您展示的是长沙星大型互动项目。《史记·天官书》中记载：“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在二十八星宿中轸宿旁有一颗小星星名为“长沙”，古人按星象分野的理论，将长沙星对应的地方命名为长沙。

请您走近互动区，张开双手触发互动，双手中将会呈现由星辰汇聚而成的长沙二字。请各位随我一道穿越历史的走廊、倒转时空，走进二十万年前的长沙——湘江晨曦。

**第一部分：湘江晨曦（史前时期）**

**第一单元：击石为器**

长沙最早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这是一组浏阳市永安镇出土的旧石器，这些石器出土于距今约20万年的网纹红土地层，是典型的打制砾石石器，说明当时的原始人类已学会了制造工具。这批旧石器为砍砸器和尖状器，可以用于砍树、做木棒、砸坚果、挖掘根茎类植物等工作。

**第二单元：农耕初兴**：

距今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

**第一组：大塘文化：**

1985年长沙市进行文物普查时在长沙县三兴村大塘组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遗物。为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考古工作者将该遗址命名为大塘遗址。

这组器物是大塘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其中有用于农业生产的斧、镰、铲等，石镰的出现说明当时的稻作农业有所发展；有用来加工工具的石锛、石凿等；而网坠等工具则是用于狩猎。

大塘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划有各种组合图案，少量陶器有红色或褐色彩绘图案，体现了大塘先民的审美情趣和原始宗教的风貌。

这件带支座陶釜是大塘文化中常见的一种炊器，主要用于烹饪食物和烧水。这三个支座保存完好，向我们展示了陶釜的使用方法，支座将陶釜支撑起来，底部空间则用以生火烹饪食物，是陶鼎的雏形。

**白陶彩绘鸟纹双耳罐**

大塘遗址出土的陶器纹饰特别丰富，其中这件白陶彩绘鸟纹双耳罐，是新石器时期南方最精美的彩陶。陶罐陶质黄白，外施白色陶衣，口至颈肩部依次彩绘干栏式建筑纹、水波纹、植物纹，耳部彩绘方格纹和四出花瓣纹，腹部彩绘四组凤鸟树冠纹，凤鸟昂首朝阳，嘴衔叶穗。彩绘纹饰精美，构思奇巧，反映了长沙先民对太阳和神鸟的崇拜，展现了大塘先民高超的制陶技艺。陶罐使用了非常珍贵的白陶泥，用褐彩装饰了繁复优美的纹饰，表明它很可能是大塘先民从事宗教仪式时祭司或首领专用的祭器。

这是大塘先民崇拜太阳宗教仪式的场景，大塘先民在对大自然的崇拜中，对太阳的崇拜表现尤为突出。他们认为，太阳能够驱除黑暗和邪恶，是带来光明和生机的保护神。

大塘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反映在他们的彩陶图案中，这件红色彩绘太阳放射纹饰口沿，就是太阳崇拜的产物，口沿上的红色条纹是太阳的光芒，排列整齐、美观大方、非常珍贵。

大塘遗址出土的陶器大部分装饰有太阳、飞鸟、植物等组合图案，反映了7000年前原始先民的生活景象。这件房屋纹陶器残片上刻划了许多类似干栏式房屋的图形，可以推测当时人类已告别原始洞穴，形成了干栏式建筑的聚居形态。这种建筑形式适宜居住，至今仍在少数民族地区流行，像土家族吊脚楼就是这种类型的建筑。

**第二组：聚落星布:**

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年代距今约6500年—3000年。

其中腰塘遗址位于长沙县冯家河东岸。1988年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以及半地穴式房基遗迹。为年代距今约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

我们在腰塘遗址发现了一座面积为16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基遗迹，穴坑深约1米，门道呈斜坡状，近地面处有二级台阶。房基底部平整，地面上有陶片、碳化植物颗粒、鹿角等堆积物。半地穴式房屋建筑表明长沙先民已形成了稳定的聚落生活。

通柜中这件**釜形陶鼎**的造型与带支座陶釜非常相似，同样也是作为炊器使用，在底部生火制作熟食，它们的区别在于釜形陶鼎将底部的支座变为三细足与陶釜融为一体，使用起来更加便捷。这也是后世铜鼎的雏形。

**第三单元：上古传说**：

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有许多关于长沙地区上古历史的传说，大多与三皇五帝有关，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制度瓦解，国家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面貌。

大约在尧、舜、禹时期，中国南方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史称三苗。文献记载三苗曾在长沙建立了古三苗国，其活动范围在今湘江中下游区域和洞庭湖平原。

这些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也都在长沙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第二部分：青铜之乡（商-西周）**

作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血脉的重要分支，湖南商、西周青铜器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先民的艺术才华和审美情趣的静态呈现，20世纪初以来，以宁乡县黄材镇为中心的区域相续出土了以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为代表的大批精美商周青铜器，被学术界誉为“宁乡商周青铜器群”和“南中国商周青铜文化中心”。本世纪初，宁乡炭河里城址西周初期城墙、壕沟和宫殿基址等重大考古发现，表明商周时期长沙地区存在发达的青铜文明方国。这些在湘江流域发现的精美器物跨越了多个世纪，集中展示了湖南地区青铜文化从源起到鼎盛的过程。

**第一单元：商周南征**

中国历史上的商和周，是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商王朝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倾力开疆拓土，商文化得以传播四方。根据文化遗存分布推测，位于江汉平原的盘龙城是当时长江流域的重要据点，商人由此跨过长江，来到洞庭湖平原，进入长沙地区，带来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将长沙历史引入了青铜时代。西周时期，周王朝多次南下征伐，周文化的影响也波及到了长沙地区。

**这是一组商周青铜兵器**，其中这件**龙纹带斧铜刀**的形制非常特殊，斧的刃部比刀厚，劈砍时不容易折断。刀背上立斧，增加了刀的砍劈功能。整件器物可谓体现了湖南地区铸铜艺人的独具匠心。

**第二单元：神秘方国**

三千多年前，原始居民、殷商后裔、西周子弟在三湘四水共同生息。他们交汇于群山环抱的黄材盆地，以水为池，择地为城，一座方国都邑从此崛起。尽管自然的力量几乎抚平了先人的足印，然而偶然的发现如石破天惊，开启了探寻方国踪迹序幕。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址？城有多大？形状和布局又是如何？接下来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近**炭河里遗址**。

1963年，炭河里遗址被发现发掘，现存面积约20000平方米。2001年至2005年，考古工作者经过三次科学发掘，于城址保存区西北部发现古代**城墙和壕沟，**是古代城址的重要防御设施，壕沟还具有排水功能。同时还发现了标志着国家文明初步形成的**宫殿基址**以及能够研究当时城中人员结构的重要资料**墓葬群**等重要遗迹。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遗物，而青铜器均为打碎后随葬，表现出独特的葬俗。炭河里城址是目前中国南方地区西周早期城址的首次发现，也是西周早期方国的政治中心。它的发现，填补了湖南西周时期历史的空白，为研究湖南乃至南方地区西周时期社会形态、组织结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高砂脊遗址**,位于望城县高塘岭镇，是沩水入湘江河口的长条形沙洲，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1996年至1999年考古工作者对此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发现19座墓葬以及陶灶等遗迹，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和陶器等遗物，其文化面貌与炭河里遗址十分接近，是炭河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遗址是西周时期以炭河里为中心的方国次中心。高砂脊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从其器形、纹饰、铸造工艺分析，其中大部分应是本地铸造，极小部分直接来自中原。

**第三单元：青铜神韵**

湖南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以宁乡最为集中。宁乡地区目前发现的铜器有400余件，因而有“宁乡青铜器群”之称。它们大多分布在距离炭河里遗址不远的山坡河畔，其用途可能与祭祀山川河流有关。长沙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一方面在器形、纹饰、铭文风格等许多方面表现出中原风格；另一方面有着相当浓郁的地方风格。两种风格的并存共生，构成了长沙地区商文化的独特面貌，反映了商文化南传过程中与本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人面方鼎**是中国唯一的以人面纹为饰的古鼎。器身外表四周饰半浮雕的人面。鼎腹内壁铸“大禾”两字铭文，整件器物很可能是稻谷收割之后举行祭天大典时，在鼎内盛满着稻谷。商、周青铜器以兽面纹作主题纹饰较为常见，人面纹饰则极为稀有珍贵。 宁乡发掘的**铜瓿（bù**小瓮，圆口，深腹，圈足，用以盛物。**）**是目前发现的商代铜瓿中体型最大的，重达61.9公斤，称为瓿王，在当时是一种酒器。铜瓿肩部有4处铸造时留下的痕迹，推测原本是铸接有4个牺首。现存铜瓿多为商、周遗物，战国以后的极少见到。

商周时期的大多数青铜器使用陶范法，并且一套陶范只能铸造一件青铜器，因此不可能存在两件一模一样的青铜器。卣（yǒu）是一件盛酒器，盛行于商周时期。只有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才会使用卣。这件**兽面纹提梁卣**，1971年浏阳县出土。腹部装饰一个兽面，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一。器物通体线条流畅而稳重大气，是一件十分难得的精品。

考古发现，最早的觚（gū）型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云雷纹铜觚**造型为圆形细长身，喇叭形大口。商周时期的觚相当于酒杯，器身常饰有蚕纹、饕餮、蕉叶等纹饰。西周后期逐渐消失。

**第四单元：铙乐悠扬**

铙（náo）是长沙出土商代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长沙也是出土铜铙最多的地区。在礼乐盛行的时代，人们用珍贵的青铜礼器维护伦理和谐、尊卑有序，供奉先祖、鬼神，以及万物之灵。这套**乳钉纹编铙**共9件，由小到大造型一致，纹饰大体相同。铙体呈褐绿色，通体阴刻云雷纹，钲（zhēng，古代打击乐器）部酷似两片合起来的瓦块，两面各有3排乳丁,每面18个。轻轻敲击它，便发出洪亮悠长的共鸣声。敲击铙的正鼓和侧鼓能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9件铙组合敲击时古代的五音俱全，可以演奏各种古乐曲，是目前我国最早能成编演奏的乐器。

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公认为“中国电影大片时代里程碑”，而此前已经凭《卧虎藏龙》获得了第44届格莱美“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大奖的旅美华人音乐家谭盾，负责了《英雄》的原声音乐。谭盾大胆采用了铙乐的元素，提升了电影古朴的质感。在电影画面中，乐师敲击编铙的情节，让旋律优美的铙乐响彻世界。

接下来您欣赏到的是，我馆镇馆之宝——**[象纹](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C0316-GgCAC8LO65O_CSJ6TrKvc6b&url=http://baike.baidu.com/view/3036486.htm)**[**大铜铙**](https://mail.qq.com/cgi-bin/mail_spam?action=check_link&spam=0&spam_src=1&mailid=ZC0316-GgCAC8LO65O_CSJ6TrKvc6b&url=http://baike.baidu.com/view/3036486.htm)。于1983年出土于宁乡县，重达221.5公斤。其中最为有趣的是燧部，装饰有一对扬起鼻子互相碰撞的小象。象纹饰出现在铜器上应是当时人对大象喜好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安详端庄的品格。我们长沙博物馆LOGO，也是由商代象纹大铜铙的形象转化而来。从外形上来看像两扇写意的门，分别取自于英文单词的“Museum”(博物馆)的首字母“M”和中文汉字中的门。两扇门，一进一出。一扇是穿越的门，馆藏文物从古代穿越到现代，告诉观众古代历史文化；另外一扇是感知历史的门，带领观众进入到历史的长河中，回看历史、感悟现代生活。

长沙博物馆以馆藏商代铜铙为主体，组织开展中国南方商代音乐文物的研究与开发利用工作，复仿制商代铜铙及其它商代乐器70余件，创造出一批商周时期的古乐曲，培训演奏人员，组成“中华南方古乐”演奏乐队。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南方古乐复原场景展示**，驻足于此，耳边仿佛聆听到从远古传来的声声古乐，让人不禁遥想商周时期沅湘居民望祭山川、神灵时的那份虔诚与庄严。

**第三部分：楚南重镇（春秋战国）**

**第一单元：百越杂处**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奴隶社会崩溃和封建制度确立的时代。新旧交替、风云激荡，长沙地区的历史也随之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春秋早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止，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的一支——扬越则一直在长沙地区繁衍生息。因此长沙也被称为“扬越之地”（**春秋形势图**）。

越式鼎是越人生活的代表性器物，其造型一般为敛口，垂腹，口沿有外撇环耳、梯形耳或牛角形竖耳，足细长外撇，盖、腹部多饰绹索纹、蟠虺纹等。

**第二单元：军事要垒**

春秋晚期，楚人来到长沙。由于长沙战略位置重要，长沙成为楚国往南拓展的重要据点。楚人在这里设县筑城，厉兵秣马，使长沙成为了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

**第一组：设县图治**

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沙地区共发现楚墓约3500座，这些墓葬规模较小，墓坑较窄，随葬器物以日用生活陶器为主，少见礼器，墓主身份一般为下层平民。

考古发掘出土的楚简及青铜器铭文中，多次见到“长沙”、“长沙公”的记载，说明楚人南下将长沙纳入政治版图后，设置了长沙县，并委派军政长官对长沙进行治理。长沙也从此时开始，成为湖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二组：南征蛮越**

战国初期，越国灭掉吴国，称雄于东南地区。南下扩张的楚国与谋求霸权的越国形成激烈冲突，双方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长沙地处楚越交锋的前沿阵地，长沙楚墓出土的大量兵器，即是楚越争雄的物证。

我们面前这个庞大的剑阵就是当年战场频繁、兵器多样的缩影。

尤其是长沙东郊的张公岭楚墓，其墓葬中出土兵器的比例较其他地方高出很多，说明这些墓葬是戍守长沙东面门户的楚军墓葬，张公岭是当时长沙城外的一处戍所。

剑是古代最为常见的短兵器，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此处陈列的**战国带鞘铜短剑**，剑与剑鞘为一体，剑身较短，为防身短剑。剑脊凸起，自漆柄处逐渐向尖端收缩，并形成锐圆状剑锋。这件带鞘铜剑髹漆完整，光亮如新，形制较为特殊，是一件十分罕见的先秦兵器。

展柜中这套**战国铭文铜戈与错金银戈鐏**也颇具特色。戈为长兵器的一种，是车兵以及骑兵作战使用的格斗兵器，它能够在大范围内打击敌人。这件戈鐏，以错金银工艺装饰卷曲云纹，是错金银云纹戈鐏中的精品。戈鐏位于柲下方，它既是装饰，又能防止柲在地面过度磨损，还能在使用时准确把握戈的方向以及牢固地抓持。

旁边这件**战国菱形纹矛**为国家一级文物，整体呈柳叶形，通体饰菱形暗格纹，此类菱形纹装饰风格揭示了我国早在2500年前就已掌握了金属膏剂涂层工艺，也就是表面合金技术。 **（器物任选一件）**

这些兵器和战车都反映了当时高超的战争装备制造水平。

**第三组：营建城邑**

由于战争频繁，当时的楚国也需要修筑城池来抵御越人的进攻。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区黄兴南路与蔡锷南路之间发现了一段城墙遗址，据考证是战国长沙城东城墙的一部分，这也表明至迟在战国中期长沙已经修筑城池。战国长沙城的出现，标志着长沙城市发展的开端。

战国长沙城东起蔡锷路，西到下河街，南临坡子街，北至五一西路附近，为长方形格局。

这里复原的**五一广场长沙古城地层剖面，**从下至上依次为战国、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及近代文化层等。这也表明，五一广场及其周边从战国以来一直是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虽然历经两千余年，长沙的城市规模不断地壮大和扩展，城市中心却不曾变更，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第三单元：经营开拓**

南下的楚人带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特别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促进了长沙经济的发展。到战国中晚期，南楚境内的商品经济日趋活跃，长沙逐渐成为楚国南部重要的商业中心。

表格中所列举的这些铁制生产工具的出现及牛耕技术的广泛使用，促进了长沙农业的发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云“长沙，楚之粟也”，说明长沙是楚国重要的粮食产地。

生产力飞跃的另一个体现是手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长沙成为楚国制造业的中心，这里陈列的**铜镜、玉器、琉璃器、漆木器**都是当时的代表性器物。

战国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长沙是楚国的铜镜铸造中心。楚式镜以铸工精巧、质地轻薄而著称。其中最为流行是山字镜，四山镜出土得最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战国草叶纹五山字镜**是其中罕有的珍品，到目前为止，经考古发掘出土的五山镜仅有4枚。

就楚国的玉器来说，其具有形式多样，款式精致的特点，造型变得更加舒展，并且动感十足，主要体现在晚期龙凤造型的玉器上，动物栩栩如生，使玉器更富于灵性。纹饰方面，楚地玉器纹饰繁缛，一般会在空隙地方加刻綯索纹。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透雕龙凤纹玉佩**，为和田青玉制作，两面透雕连体龙凤，为战国玉雕之精品。

此外，楚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琉璃器。琉璃器，也称料器，最早产于西亚和埃及。特别是这颗**战国蜻蜓眼琉璃珠**呈圆管状，通体呈绿色，中间有圆孔可以穿绳佩戴，器表突出30个半球形颗粒，颗粒底部饰白色圆圈，状似蜻蜓眼，该器物形体硕大，为同时期的琉璃珠中所罕见。经检测，这颗琉璃珠中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铅和钡，属于本地生产。

同时，战国也是中国漆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楚国的髹漆业在各国中最为发达的，先秦漆器以楚墓出土得最多。漆器多为王侯贵族所使用。其中更为有意趣的这件**漆虎子**，为溺（音“尿”）器或水器，其用整木雕成，形状似虎，尾反卷至头部形成提梁。器身线条流畅，形态生动，是国内所见最早的虎子之一。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货币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蚁鼻钱**又叫鬼脸钱，是楚国特有的货币， “蚁鼻”即小钱的意思。另外，楚国在大宗商品交换时，需要使用切割成不同大小的黄金货币 “郢称”，天平和砝码就是称量货币的衡器。长沙是出土战国时期砝码最多的地区。砝码个数不等，最少的1个，最多的10个。成组砝码中每个重量不等，最大的约250克，最小的0.3克，10个一组的砝码总重量约500克。大量衡器的出现，体现了战国时期长沙地区工商业贸易的繁荣。

**第四单元：南楚风采**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随着民族的融合，楚文化不断吸收本地的越文化因素，形成了长沙“尊礼崇乐”与“好巫祈福”特色南楚文明。

**第一组：礼乐文明**

当然，最能体现礼乐制度的莫过于丧葬制度，葬制和礼器是古代王侯贵族身份等级、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尤其是对礼器中的鼎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平民不得使用礼器，也就是说“礼不下庶人”。

从中间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上至下，大体上是墓室规格越来越小，墓室结构越来越简单，棺椁数目和随葬品数目也逐级减少。青铜鼎一般只有士以上的贵族才可以使用，平民一般只有少量而廉价的陶器随葬。细心的观众一定发现了，其中有一个楚墓没有遵循我说的这个规定，那就是荷花池一号墓。这个墓使用了两椁两棺，属于逾礼现象，也说明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已经出现。

这里复原的**浏城桥一号墓，**是长沙市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楚墓。同时，墓中出土的兵器达93件之多，占出土文物的三分之一，还有车马器陪葬，推测墓主人是一位领兵作战的将军。

**第二组：信巫重祀**

此外，信巫重祀为楚国之大俗，楚人相信万物都有灵，认为人死后还存在一个 “神鬼世界”。

**虎座凤鸟架鼓**，全器造型逼真，彩绘绚丽，既是鼓乐，也是艺术佳作。这反映了楚人凤鸟崇拜、向往安详的观念和征服猛兽、不畏强暴的精神。

乐制是礼制的从属部分。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将乐广泛地用于军事、宴享、祭祀、婚丧和外交等方面。南楚境内发现这些钟、鎛、琴、鼓等乐器，是南楚长沙地区尊礼崇乐的表现。

**第三组：简帛流芳**

楚国另外一个令后世叹为观止的艺术创造是简帛，这幅**战国子弹库楚墓缯书（复制）**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用丝帛书写的书籍，其原件收藏于美国。帛书中13行文字的为《天象》，记录的是彗星等天象灾异；8行的为《四时》，记录的关于伏羲、炎帝等的上古传说，以及四时、昼夜形成的神话。四周的12神图则与《月忌》中记录的12个月宜忌一致。

此外，在战国子弹库中还出土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两张帛画**战国人物龙凤帛画（复制）和战国人物御龙帛画（复制）**，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同时，战国人物御龙帛画中人物的刻画则被誉为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杰出代表。197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了一套两枚的《长沙楚墓人物帛画》特种邮票，足见这两幅帛画在国宝级文物中的地位。

长沙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楚汉名城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而屈贾之乡的文化赞誉则与两位文化名人密切相关，其中较早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屈原主张举贤授能，却因楚怀王听信谗言，而被诽谤排挤，流放至南楚境内，最后因悲愤在汨罗投江而死，这首《怀沙》就是屈原的绝笔之作。楚国百姓为了悼念屈原，将他去世的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并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等风俗，屈原也是湖湘文化的源头。

**第四部分：大汉王国（秦汉时期）**

汉代是长沙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长沙地区，从楚秦县郡演变成为汉代长沙国。长沙国共历经221年，也是汉代历史上重要的诸侯国之一。

[秦始皇](http://baike.baidu.com/view/2389.htm)灭六国后，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http://baike.baidu.com/view/41060.htm)，实行郡县制，此后长沙郡建立。在这里为您展示到的是**秦式文物一组**以及**秦半两铜钱**。**秦半两**货币形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钱币走向了成熟，同时也是中国货币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

**第二单元：封藩建国**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建立吴氏长沙国，共传五代，历经46年，后因无嫡嗣长沙国被废。汉景帝继位第二年封其庶子刘发为长沙王，建立刘氏长沙国，共传八代九王，历时175年。长沙国的建立，巩固和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统治，推动着湖南地区社会文明的迅速发展。

独立柜中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吴氏长沙国**三枚印章（曹女巽、妾女巽）。**印章出土于长沙陡壁山一号墓中，在印面上分别使用鸟虫篆体白文刻有曹巽、妾巽二字，其中两枚印章为长沙王后私印，带金丝环印章相当于玉口含。印面成正方形，印章上方有鼻穿，两者字体华丽婉转，选材精良，制作考究，是汉印中的上乘之作。

刘氏长沙国出土了**“长沙王印”、“长沙王玺”两枚金印，**这两枚金印造型精美、印文清晰，我们可以看到印章上方有一只站立的龟，有昂然挺拔之气。龟身下有一凹窝，是用来系绶带。印面呈正方形，阴刻篆文“长沙王印”、“长沙王玺”四个字，据专家推测属定王刘发所有。

西汉长沙国采用中央官制制度，丞相由中央直接委任，统领百官。太傅是国王的辅佐大臣。丞相、太傅以下众官，各司其职。在这个部分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吴氏长沙国的丞相轪侯利苍和太傅贾谊。

在对面您可以看到一尊**贾谊的塑像**，贾谊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公元前177年被贬为长沙王吴著的太傅。贾谊在长沙的三年，占据了他人生黄金时期的四分之一，并在这里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骚体赋《吊屈原赋》、《鵩鸟赋》，这对于中国文学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离开长沙后，湖湘人被他少壮忧国的精神所感动，保存了他的住宅，为他建了祀堂，世世代代祭祀不觉，礼敬有加。

展柜中展示到长沙司马、长沙郎中令、长沙都尉等印章各一枚，司马为掌管军政的长官，郎中令责担任保卫长沙王宫殿一职，都尉太守掌管军事。

西汉长沙国于南越国交往十分密切。南越国是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的地方政

权。长沙国是南越与汉王朝联系的纽带同时也是汉廷防御南越国的前沿阵地。

这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和驻军图。**地图为绢质，经测算，图上绘制的河流骨架、流向、山脉等大体与现在地图相似，可以说这幅地形图在世界地图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旁边这幅驻军图上着重标出了9支军队的驻地、军队番号、行动路线等等。确定该图为墓主轪侯利豨参与指挥所使用的军事地图。

**第三单元：王国气象**

长沙国时期，王都修筑一新，人口增长迅速，社会日趋繁荣，展现了西汉长沙国政治、经济、科学、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水平与欣欣向荣的气象。

王国都城是在战国楚城基础上修筑而成，相对战国楚城，城区面积继续扩大，东面在今天南阳街，南未超过解放西路，西在太平街，北在青少年宫影剧院与中山西路之间，形状略呈长方形，周长约7里。

这边展示到的陶井圈、瓦当、筒瓦，都是为汉代宫殿、官署区所专用。在**省供销大厦出土的西汉简牍，**大部分属于司法文书，为长沙国王室档案，因此确定该区域为长沙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西汉长沙国王陵主要分布于湘江西岸。目前已发现25座墓葬，其中已正式发掘5座王室墓葬。西汉长沙国王陵是我国已发现的西汉诸侯王陵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

除王陵外，也发现了保卫王陵的陵邑。长沙国陵邑位于湘江西岸的三汊矶，总面积为50万平方米。平面呈不规则的四边形，东以湘江为屏障，西、南、北三面构筑夯土城墙，其功能是为卫戍长沙国都城和长沙国王陵。

1974—2008年期间，前后相继发掘**陡壁山曹女巽墓、象鼻嘴一号墓、望城坡渔阳王后墓、风蓬岭一号墓以及风盘岭一号墓葬，**墓葬都呈“甲”字形或“中”字形竖穴岩坑墓葬，墓坑内都发现黄肠题凑葬制。他们身份都为某代长沙国国王或王后。在这些墓葬中都发现了大量的金器、玉器、铜器、漆器等，折射出了王侯贵族们雍雅华贵的生活景象。

汉代，金银制作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您眼前这些**金饼**出土于风篷岭汉墓，是皇家用于祭祀祖先的，又称为“酌金”。这些金饼虽然深埋地2000多年，但是光彩仍然是依旧的。

**西汉五铢钱**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古代货币，在[中国](http://baike.so.com/doc/1279856.html)历史上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久，“五铢”表示钱的重量。

**铜笵**则是古人铸造钱币的器具，“大布黄千”为王莽的年号。

（汉代大量和田玉进入中原，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既有清逸脱俗、自由奔放的特点，同时具有典型的雄浑豪放、气势昂扬的特征。

**透雕龙凤纹玉组佩**

玉组佩出土于墓主的左侧腰腿部。系由30件形制各异的玉环、玉鸡心佩、玉璜形饰及水晶、玛瑙珠组成。上端以透雕龙凤纹青玉环总揽组佩，玉环双面饰以龙凤纹和云纹，器物刀法精准、造型生动。中部为两件玉质鸡心佩。下端为黑白纹饰的玛瑙制作而成。这件玉组佩彰显了汉代贵族生活的奢华。在汉代，玉组佩的使用有严格的制度，是区别贵贱、等级的标志。这套组佩应该是墓主人长沙国王后“曹巽”生前的心爱之物，死后随葬，表达了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思想。

**玉贝带饰**

该组带饰由**透雕兽纹玉带扣**和**玉贝**组合而成，均为透闪石软玉，色泽润白。两件玉带扣材质细润、微受土沁，扁体长方形边框内单面镂雕一瑞兽，瑞兽四周饰以流云纹，图案布局严谨，形象生动。12枚玉贝，正面微鼓，反面平整，每件中部雕出一条窄长的深磨槽，槽的两侧有线磨痕，西汉时期玉贝已经失去了它的货贝功能，从而成为了一般饰品。该组带饰出土时位于棺的中部，左右对称放置，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应为墓主生前的腰间带饰玉。

**玉礼器**

此套礼玉由各式玉璧、玉璜、玉圭和玉环共12件组合而成，均为青绿色透闪石软玉。纹饰以凤鸟纹、蒲纹、云纹、双身合首龙纹为主，装饰风格有了新的发展，雕琢水平均超过前朝。楚汉时期，礼仪用玉部分继承先秦的用玉制度，在器类上趋于简化，主要用来祭祀。部分诸侯王墓葬中将尺寸较大的玉璧、玉璜和玉环等来殓葬，其目的是保护死者尸体不朽，灵魂升天。它们通常被置于墓主人的身前、胸后、头部及墓主头部的棺板之上或两棺之间。

汉代是中国**铜镜**全面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我们在这一条展柜中可以看到，汉代铜镜大多为圆形，而且含锡较高，利于镜面的抛光，到东汉后，镜面微凸，便于照出面部全形。

汉代是铜灯制作的鼎盛时期，在各地汉墓中出土了各式各样的铜灯。豆形灯是我国最早出现，也是使用最久、最普遍的一种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长沙元年造”豆形铜灯出**土于西汉墓葬中，铜灯圆足边缘部有“铜灯高二尺重廿二斤七两、长沙元年造”的铭文，证实了是为某代长沙王即位第一年铸造的这件铜灯。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长沙漆器生产已负盛名，汉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件**“长沙王后家杯”漆耳杯**，堪称西汉时期漆器中的精品。器物杯体极薄，可见汉代工匠精湛的技艺。杯体以黑漆为底，杯内部描画出了五只栩栩如生的凤鸟，展现出了汉人精神世界中对神鸟凤凰的崇拜。耳杯壁两侧，像展开双翼的飞鸟 ，便于饮酒时双手端持，更回归实用的本质。

**第四单元：渔阳王后**

渔阳王后墓位属于西汉长沙国王陵咸家湖片区，墓葬为“甲”字形大型竖穴岩坑墓葬。在其东、西、南三面各有一个随葬坑。一号出土大量泥质灰陶器和硬陶器。二号坑为车马坑。三号坑出土了大量陶质牲、禽动物佣。该墓采用“黄肠题凑”葬制，规模庞大，是已发掘的西汉长沙国王陵中保存最为完好的长沙王室墓，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该葬制保存最为完整的西汉诸侯王墓葬之一。

我们在墓葬中发现一对偶人位于墓道东端棺椁外侧。木骨泥胎，跽坐于竹荐之上，两臂平伸作阻拦状。偶人头顶部有两个方孔，用来安装鹿角。其功能是起到镇墓，护卫墓主人的作用。

**黄肠题凑**指西汉帝王陵寝或诸侯王墓室中用黄心柏木堆垒成的框形结构。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属“天子葬制”，经天子特许，诸侯王和重臣死后也可享用黄肠题凑。渔阳王后墓是我国目前发的“黄肠题凑”葬制保存最为完整的西汉诸侯王墓葬之一。

渔阳王后墓葬中文物上刻有“渔阳”二字，墓名由此而来。墓主为西汉文景时期某吴氏长沙王之王后，渔阳乃汉廷公主，嫁至长沙王是为了笼络长沙国以及遏制南越国。在墓葬中，两件木楬与一件封泥为考证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并展现了汉廷公主尊贵的身份与地位。

这件**“陛下赠物”木楬**是用小木片做成的信笺，在上面书写物品及数量，就像我们现在快递的单据。木楬为半弧形，中间钻孔，用来穿系绳带。木楬上有四行隶书，共计十八个字。内容为当时西汉皇帝赐予墓主长沙国王后的随葬品的清单，表明墓主人与中央朝廷的紧密关系。

**“长沙后府”封泥匣** ，呈长方形，封泥上印有“长沙后府”四个字。封泥是古代印章盖在门户或包裹封口上的小块泥土，防止被别人打开或拆动，也称为“泥封”。封泥是古代印章直接打上的印痕，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与印章本身有同等的重要性。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后”是皇帝、诸侯王正嫡夫人的专称，其他人不可使用。“后府”应是长沙国王室自己的官府及管理机构，归属长沙王后直接管辖。地位显赫的王后去世后，她生前所管辖的官员按照当时的葬制礼仪，为她操办的随葬物品伴随主人长眠地下，象征着墓主人在另一个阴间世界继续拥有她的地位与权利。

汉代疆域辽阔，国家实现了大一统，国力日渐强盛。大量作为宴会用品的精美漆器也被能工巧匠们制作出来，满足达官显贵的享乐所需。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大量的漆器，与之相比，渔阳王后墓葬等级较高，漆器也非常精美，其中漆耳杯的生产及制作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件“渔阳”凤纹漆耳杯**，内部完全用朱红色漆涂饰，外面以黑漆为底，用朱红漆描画出变形凤鸟纹。杯子的外壁上描绘出八只凤鸟，凤鸟两两首尾相对，展示着当时漆器制作技艺的最高水准。

这件**西汉墓的“渔阳”素黑漆盆**朴素美观，具有很浓的生活气息，黑漆盆通体素雅无纹，盆内外皆用黑漆涂饰，黑漆中透着青色，非常漂亮。盆身外部底下篆刻有“渔阳”两字，揭示了漆器主人的身份。

在渔阳墓室中还出土了一件五弦木“筑”。它是古代一种五弦乐器。这件器物由整木雕刻，整体造型为棒槌状，长条形，大头部为共鸣箱。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勇士荆轲刺秦王，在易水之上击筑悲歌。同时这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一件筑乐实物。

**第五单元：王国余脉（第一组：续封郡国）**

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废长沙国改名“填蛮郡”。随后社会矛盾激化，各地都爆发农民起义，长沙国王刘发后裔刘秀兄弟顺应民意，最终击败群雄后，统一全国，重新建立起汉室皇权，史称“光武中兴”。建武二年，刘秀封刘兴为长沙王，复建长沙国。建武十三年，长沙国除，改为长沙郡。东汉长沙郡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长沙成为江南的“中兴名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沙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五一广场区域的井窖中共发现三批东汉简牍。简牍的内容多为官府文书档案，同时表明，今五一广场区域是东汉时期长沙国（郡）官署所在地。

**东汉“熹平元年”人形简**为杉木制作，先刻成人形，再在上部以墨描绘眼、口、鼻以及身体。两面墨书，内容为喜平元年替死者覃超写给道、巫世界的上言。东汉末年，道、巫盛行，人们对冥界的通灵方式呈现多样化，人形木简出土，对了解此类通灵方式提供了最新材料。

东汉长沙郡内，曾出现过一批贤良太守，以讨伐董卓的孙坚和坐堂行医的张仲景最为突出。**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曾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期间，伤寒等疫疾流行，为了拯救黎民百姓，他不断钻研医学，终于著成我国医药史上的杰作《伤寒杂病论》，同时为民治病，公然打破官府清规戒律，坐在衙口的大堂上行医，为病人诊脉开方。

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得到充足的发展。庄园主拥有自己的部曲保护庄园的安全，拥有大量的劳动人口奴婢和徒附，他们从事服务性或者农业生产劳动。东汉[庄园经济](https://www.baidu.com/s?wd=%E5%BA%84%E5%9B%AD%E7%BB%8F%E6%B5%8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vrjTdrjb0T1Y3mvP-Ph7hujTzrHn1nH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bYPW61nHnY)能较好地组织生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汉时期地主豪强十分重视墓葬。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陪葬品中除漆木器以外，陶制品被大量使用。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出现了大量摹拟生活场景的陶制仓房、灶台、兽圈、车马等供死者享用。在这一通柜中我们可以参观到数量较多的东汉时期的各种陶器。其中这件**东汉酱釉昂首陶狗**非常可爱**，**为酱色陶釉，陶狗为昂首挺立状，整体造型生动活泼，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东汉禽兽纹铜尺**的造型和现在的尺子非常相似，铜尺两面装饰有鸟兽纹，其表面有红色彩绘痕迹，称之为彩绘鸟兽纹铜尺。在东汉时期一尺的长度为23厘米左右。

这是一件东汉聚宝盆。聚宝盆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一件宝物。在中国，特别是江南名族之中的民俗，聚宝盆为镇宅之宝。

**第五部分：湖湘首邑（三国—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沙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的战略要地。到两宋时期，长沙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封建科举制度的确立，长沙书院兴盛，文运昌盛，人才辈出，成为宋代理学的重要基地和湘学中心。

**第一单元：风云要地**

长沙地处江南，占有南北贯通、东西交错的重要战略位置。赤壁之战后，吴蜀政权在荆州地区展开了激烈争夺。两晋南朝时期，长沙地区社会相对稳定，成为当时北方人口南迁的重要地区之一，社会经济在动荡中不断发展。

**第一组：动荡中的艰难发展**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混战、分裂、割据状态，江南地区却相对稳定。西晋政权灭亡后，晋皇室和北方各族人民纷纷渡江南下，民族的融合，人口的增加，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进一步促进了对江南地区的开发，长沙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和手工业产品商贸地。

孙权和刘备，中分荆州：湖南境内以湘江为界，长沙、桂阳以东属吴，零陵、武陵以西属蜀。

在六朝时期的一些名人在长沙都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三国时期韩玄在长沙任太守，受讨虏将军[黄忠](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6688/5045229.htm)管辖。韩玄墓位于今长沙市长郡中学内。

[东晋](http://baike.baidu.com/view/23932.htm)名将**陶侃**封爵长沙郡公，驻节长沙期间，致力于安抚难民，恢复生产。陶侃初入长沙时，曾于岳麓山结庵以居，并手植杉树，世称“杉庵”。杉庵故址在今岳麓书院内。

湖南最早的佛教圣地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麓山寺，**位于长沙市岳麓山山腰，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是中国金银生产和器物制造历史中的低谷,这一时期金银器与两汉相比，数量减少，体积较小。这些金器造型简洁，纹饰精致，对了解湖南古代金银工艺、金银使用历史以及当时人们的起居生活、风俗习惯、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提供了珍贵资料。

六朝时期，湘州地区青瓷烧制获得了较大发展，青瓷器品类丰富，数量庞大,为唐宋时期湖南瓷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湘阴窑，唐代称“[岳州窑](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45006)”。这件**青釉鸡首壶**便是湘阴窑烧制的作品。鸡首造型均为雄鸡，因为雄鸡有辟邪消灾的作用，且“鸡”与“吉”谐音，反映了人们对吉祥安宁生活的期望。

**滑石双猪、陶俑和石俑**等都是古人用于陪葬的“明器”。其中猪象征着财富，人物俑则是奴仆、侍卫等，象征着死后同样也能享受生时的待遇。

这是1977年夏在长沙县南朝墓中出土的“**徐副石买地券**”，为一青石平板镌刻而成，全文493字，是南朝买地券中文字最为完整的一方。买地券是记载土地买卖关系，可起凭信作用。“**徐副石买地券**”说明土地买卖和土地私有制当时在长沙地区有所发展。

**第二组：吴简证史**

1996年长沙市五一广场平和堂商厦建设区域（原走马楼）共清理战国至明清时期古井57口，在编号为第22号古井中，出土带文字三国吴简76000余枚，主要内容为三国孙吴政权长沙郡和临湘侯国（县）的地方档案，包括赋税、户籍、司法、往来文书等,涉及社会、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长沙吴简是二十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极大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见证了孙吴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长沙郡的管理和经营，对研究孙吴长沙郡、吴国的历史乃至中国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这是当时一位叫区伯的农民向县乡级官府佃田以及缴纳租税的凭证，叫做《嘉禾吏民田家莂》，“莂”是将一式两份或三份券书剖开的意思。器物两侧均有被剖分的痕迹，它是一式两份的劵书，就如今天的两联单。

**户籍简**记载了民籍、吏籍、兵籍、家庭户籍以及户籍检核制度等资料，使我们对孙吴户籍制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司法文书**常为木牍，杉木制作。内容主要记录了孙吴嘉禾时期的户籍审核、民事诉讼、经济审判等案件。

**签牌**即木楬、标签。

**名刺**性质类似于现在的名片，其上写有姓名、籍贯、字号等，主要用于拜访时自我介绍。

**第二单元：盛世潭州**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开放发达、繁荣富强的统一多民族封建集权国家。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和封建科举制度的完善，长沙地区社会清明，城市扩展，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人文荟萃，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军事重镇和商贸、文化中心。

**第一组：潭州风华**

潭州城四至范围大致相当于今长沙市北起中山路、南至解放路，西起湘江路、东至蔡锷路，是唐代江南地区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潭州（长沙地区）的粮食供应在唐王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全国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安史之乱后，南方成为了唐王朝主要的赋税来源基地。

唐代是中国古代瓷器文化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在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发展中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组瓷器基本上为青釉瓷，胎质细腻，釉色均匀，形制优美。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非常频繁的时期，铜镜也迎来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大量外来文化体现在铜镜的纹饰上，葡萄纹就是吸收自外来文化。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件**瑞兽葡萄纹铜镜**，铜镜饰满葡萄文，内区围绕兽钮环装饰五个瑞兽，姿态各异，在葡萄枝蔓间嬉戏。

**中南工大唐墓**位于中南工业大学桃花岭，是目前湖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唐代砖室墓。墓主人应为晚唐潭州府高级军政贵族，为夫妻合葬墓。

此墓出土了各类珍贵的文物有50多件，主要以金银器、瓷器、铜器为主。唐代饮茶之风盛行，饮茶器具十分考究。中南大学唐墓出土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银质、瓷质饮茶器具，包括碾茶器、贮茶器、点茶器、饮茶器等，与陆羽《茶经》的记载基本相合，反映了唐代上层贵族的茶饮风尚。

展柜中这一组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汉式镜，创造出各种花镜，其中**“****唐星宿八卦纹铜方镜”**是别开生面的方形铜镜。这件铜镜形体大气厚重，饰有八卦纹、福禄寿纹和二十八星宿纹，十分罕见，为研究唐代天文学提供了重要资料。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金银器制作的巅峰之一，在世界金银器中也独树一帜。插梳是唐代非常流行的一款妇女发饰，且历史悠久。这对莲花纹金梳的出现让我们能够一窥唐代妇女雍容华贵的风采。这两件金梳呈马蹄形，纹饰基本相同，中间有一朵盛开的莲花，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

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全国佛教大兴，禅宗在江西、湖南两地得到迅速发展，道林寺、密印寺等一大批佛寺的兴建是这一时期潭州佛教极盛的见证。

这件**佛顶尊胜陀罗尼幢**的经幢整体为模拟古代佛塔的形状。经幢作为一种宗教遗物，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解除众生秽恶道苦，二是为了解救地狱众生。只要经幢的影子或灰尘落在人的身上，经文就可以发挥作用。

**第二组：人文荟萃**

隋唐时期，潭州政治军事地位的加强，一方面大批唐代著名诗人、学者或谪居、或游历潭州，为长沙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诗篇。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古代封建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潭州籍人才辈出。这一时期，潭州人文荟萃，在诗歌、书法、医学等方面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曾三次寓居潭州，留下了近百首诗篇。诗人在769年春离开潭州赴衡州时作**《发潭州》**，成为杜甫晚年诗作中的名篇。在长沙湘江东岸建有杜甫江阁以用纪念。

**欧阳询**是潭州临湘人。唐代著名书法家，为初唐四大家之一。其书法度严整，自成一家，被称为“欧体”。

**怀素**是永州零陵人。[唐代](http://baike.baidu.com/view/17592.htm)著名书法家。自幼出家为僧，爱好书法，以狂草名世，史称“草圣”，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高峰。

**李邕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麓山寺碑》**是他的代表作，因文、书、刻工兼美，故称“三绝碑”，也是长沙市尚存最早、价值最高的碑刻。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学家，著有**《****千金要方》，**是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被国外学者推崇为“人类之至宝”，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在长沙市天心区药王街建有药王庙，来纪念这位伟大的药王。

**第三单元：唐风妙彩**

**长沙窑**位于长沙市望城区湘江东岸铜官镇瓦渣坪一带，又称“长沙铜官窑”。长沙窑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烧造彩瓷及釉下多彩瓷为主的窑口，她打破了当时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格局，成就了三足鼎立的中国陶瓷版图。长沙窑器型繁多、色彩丰富、装饰多样、题材广泛，是长沙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窑口。长沙窑在一千年前就已行销半个地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陆口岸，是名副其实的“中华彩瓷第一窑”。

长沙窑陶瓷原料均就地取材，产品大多以辘轳轮制为主，使用卧式龙窑单件装烧和多件叠烧制而成。这一组器物便是长沙窑的制瓷工具。

（高岭土、各种釉料、匣钵、研轮、研槽、毛笔与竹签、模具、瓷拍）

长沙窑分为3个窑区：即铜官镇窑区、古城窑区、石渚窑区,占地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

唐代长沙窑以龙窑为主，在**长沙窑考古发掘图照**中看到的谭家坡1号龙窑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唐代龙窑，由窑头、窑床、窑尾三大部分构成。

唐代的著名诗人杜甫和晚唐诗人李群玉都曾到过长沙窑，并且留下了《铜官渚守风》和《石渚》等著名诗篇。

**第二组：长沙窑瓷器造型**

长沙窑窑区规模宏大，烧制时间持久，产品造型丰富，品类包罗万象，包括碗、壶、罐、枕、茶碾、文房用具、造像等，几乎涵盖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组：长沙窑瓷器色釉**

中国古代瓷器发展到唐代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局面。长沙窑在“南青北白”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青釉、酱釉、绿釉、蓝绿釉以及窑变釉等种类丰富的色釉，奠定了唐代瓷器“南青北白长沙彩”的局面，对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组：长沙窑装饰艺术**

长沙窑装饰技法融南北瓷艺之大成，其以多色釉和釉下多彩为基础，广泛借鉴中国书画的笔墨传统，并融入外域文化与图式，植入文化时尚诗歌与警句，形成了以彩绘、题诗为代表的彩装饰和以模印贴花为主的胎装饰，开创了中国彩瓷文化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第一座彩瓷窑。

长沙窑吸取唐三彩的彩绘工艺和唐代青绿山水画、花鸟画等技法，创造性地将褐、绿、蓝、红等色釉以诗、书、画的形式有机地植入瓷器的装饰工艺中，瓷器成为书画艺术的载体，在中国古代绘画史、工艺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长沙窑绘画装饰中**花鸟画**占比例最大，水平最为突出。

长沙窑**人物画**题材器物非常少见，展柜中这件“竹林七贤”诗词瓷罐堪称长沙窑人物画题材的精品。在瓷罐的腹部彩绘了一幅两人谈玄图，左侧人物表情不羁，两宽袖均向左侧飘逸，为“七贤”中的阮籍。右侧人物为“七贤”中的王戎。二人相对而视，仿佛正在交谈。而在瓷罐的另一边写着一首诗，诗文对仗工整押韵，正切合“竹林七贤”酣酒畅饮的主题。竹林七贤是指中国魏晋时代的七位名士，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诗文右侧有款“七贤第一祖（组）”，由此可见此罐应是一组定制产品中的一件，今日已是仅存之孤品，更显珍贵。

长沙窑山水画一类是受到盛唐时期宫廷工笔青绿山水画的影响，但其画法自然，画面更具情趣和诗意，代表了长沙窑对于唐代宫廷山水画的民间理解。

**长沙窑写意画**以白釉绿彩的形式表现最多，是利用釉色的浸润效果而产生由点、线组成的虚实相生的抽象美感。

**长沙窑宗教题材画**主要包括摩羯、佛塔、贝叶棕榈等，其线条繁复，意境深邃，是长沙窑为开拓海外市场迎合异域文化风情的产物，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宗教文化浸润的真实反映。

**长沙窑诗词书法艺术，**诗歌与书法在唐代具有崇高的文化地位。长沙窑创造性地首次将诗歌植入瓷器装饰中，极大地提升了瓷器的观赏、审美、教化价值。目前已发现并释读的瓷铭诗中有8首出自《全唐诗》。长沙窑诗歌与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这件唐长沙窑青釉“鸟飞平无近远”瓷盘，以褐色彩书“鸟飞平无近远，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四句诗文。这首诗原为唐代诗人刘长卿所写《苔溪酬梁耿别后见寄》，被收录在《全唐诗》中。这首诗是刘长卿被贬时所作，表达了作者的悲愤愁苦之情。全诗景中含情，笔致清婉，结句虽含慰藉，意实深悲，伤感之情，寄于言外。

除诗歌外，长沙窑瓷上还有不少谚语警句，其内容多样寓意深刻，包括人生哲理、忠孝廉洁、耕读科举、勤俭持家等哲语警言，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两税法”的确立，为封建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民间商业经济的繁荣开辟了道路。长沙窑浓厚的商业行为和强烈的广告意识在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长沙窑瓷上运用的商业广告最多的一类就是作坊名。其中这件青釉褐彩“年家”瓷壶腹部以浓墨重彩书写“年家”二字，可证明此壶为年家作坊所制。在商品上写上作坊主的姓氏，有着对产品负责的意味，旨在宣传本作坊，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

**长沙窑模印贴花工艺**最具特色，其内容丰富多彩，造型细腻入微，有人物、动物、植物、花鸟等，其中包含有“洋”味十足的西亚文化元素，各具形态的贴花造型将长沙窑瓷器生产装饰更规模化和效率化。

**长沙窑雕塑产品**包罗万象，佛家造像、生活用具、文房用品、儿童玩具等应有尽有，尤其是儿童玩具是别开蹊径，独树一帜。采用捏刻塑雕与模制相结合，大量生产各类动物形象玩具，栩栩如生。

9世纪后期的晚唐时期，因北方持续战乱，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被日益阻断，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长沙窑在大唐文化容纳万有的景下，创造性地生产适销亚非地区产品，凭借石渚天然的港口，产品行销大江南北，足迹遍布亚、非两洲，成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的大宗商品

我们可以看到长沙窑瓷器装船出航的场景复原，江面上帆船如[过江之鲫](http://hanyu.baidu.com/zici/s?wd=过江之鲫&from=pcus&srcid=28204&query=形容多的成语)，码头上工人们热火朝天的搬运着即将销往世界各地的长沙窑瓷器，呈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繁华局面。

2010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万达广场片区建设工地进行考古发掘。在此区域发现了晚唐五代时期码头遗址等重要遗迹，为研究长沙古城的商贸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这就是晚唐五代时期码头遗址中的码头木，它走过千年时光，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长沙窑的兴衰史。

**第四单元：马楚王国**

唐末，武安军节度使马殷统一湖南，建立封建割据政权楚国（896—951年），都潭州。马楚王国共传六代，历56年，是湖南历史上唯一以长沙为中心建立的封建王朝。马楚政权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等政策，经济上采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业、提倡纺织、通商中原等措施，湖南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长沙城市得到了极大拓展，为两宋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组：马楚国都**

马楚政权养士息民，发展农商，潭州成为五代时期重要的商贸都市。马楚政权后期奢侈骄逸，大兴土木，宫殿、楼台、佛寺等园林建筑蓬勃发展，潭州城得到了极大拓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最繁盛的都城之一。

五代十国指中原地区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和南方和河东地区的十个封建割据政权。从**五十代国形势图**可以看到马楚王国全盛时，管辖区域共24州，就是今湖南省全境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贵州省东部和广东省北部。

**《楚王马殷纪功碑帖》**是1920年拆除长沙浏阳门城墙时出土，碑帖现存湖南省图书馆。马殷统治时期，社会稳定，国库殷实，湖南经济得以发展和繁荣。此碑文颂扬了马殷的历史功绩，是研究马楚王国的珍贵资料。

马楚政权设置溪州刺史，辖永顺、龙山、保靖等县。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爆发。940年楚王马希范与彭士愁罢兵议和结盟，立铜柱于今永顺会溪坪酉水河岸。盟约规定彭士愁为溪州刺史，各自所辖地域互不进犯等。溪州结盟化解了民族纷争，开创了湘西溪州八百年土司王朝的统治。

**溪州铜柱**是土家族历史的见证，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

**第二组：商旅四方**

马楚政权利用地处南方各政权中心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原和周边国家的商业贸易，使马楚呈现出国富民强的社会局面，潭州成为五代时期重要的商贸城市。

为了发展商业，马殷采纳大臣高郁的建议，沿用**唐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钱**铸造铅、铁钱币在境内流通。由于铅铁钱币笨重，携带不便，就只能把这些钱币换成湖南本地货物运出去，因此促进了湖南地区的出口贸易，刺激了生产，增强了财力。

马楚国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在“龟塘”修建了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能溉田万顷。“龟塘”也就是现在的**圭塘**。

茶税为马楚主要税收来源。为促进茶叶的生产与贸易，马殷采纳高郁建议，在汴、郢、复等州**设置回图务**（相当于商行），运茶于[中原地区](https://www.baidu.com/s?wd=%E4%B8%AD%E5%8E%9F%E5%9C%B0%E5%8C%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WD4uh7-rjTzPvuWrH0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6Ln1b3PWDs" \t "_blank)，换取纺织品、战马，获利“岁百万计”。马楚茶马互市的开辟，使长沙成为明清时期中国万里茶路的重要起点。

五代时期瓷器的胎釉、[器型](http://zlk.sssc.cn/w/%E5%99%A8%E5%9E%8B)、纹饰等都与唐代风格有着继承和变革的血脉联系。唐到五代，笨拙粗重的造型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精巧优美的新型产品，丰富多样，风格鲜明，具有新的时代的特征，在工艺方面也更为成熟。唐代的雍容浑厚，五代的优美秀致，各具特色，而又都表现着我国传统的民族风格。

**第五单元：潇湘洙泗**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江南的确立，潭州战略地位尤为重要。这一时期，潭州政局相对稳定，农业、手工业获得了极大发展，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格局基本定型，商业繁荣，人口稠密，成为中部地区的商业都会。封建科举制度的完备，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潭州书院兴盛，群贤汇集，人文兴发，学术昌盛，成为“湘学中心”，同时，湖湘学派的形成，也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一组：湘岭要据**

两宋时期，潭州是湖湘地区政治军事重镇，其战略地位十分显要。两宋统治者加强了对潭州的统治，一大批名吏贤臣治理潭州，潭州社会获得了极大发展，为长沙明清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两宋时期，潭州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格局**（**四至图**）基本定型，整个城市负山面江，蔚为壮观。潭州城虽在金、元南侵中屡遭战火，仍为“湖湘一大都会”。先后有**李纲、岳飞、辛弃疾、朱熹、文天祥**等重臣名将任职潭州，治理湖南，潭州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发展。

**第二组：坊市遗迹**

两宋时期，城市里坊制度和夜禁制度被取消，形成了开放式街巷的城市格局。考古工作者在坡子街、五一广场以及万达广场、九龙仓等建设工地，发现了宋代长沙城墙、排水实施、房基等遗迹，再现了两宋时期潭州城市的风貌。

这些涵渠、道路、排水管等城市基本设施体现了古人的高超智慧，同时水井的大量开凿又方便了生产和生活，特别有意思的是右下角这个冰井，又叫冰鉴，也是较早的自然环保又经济实用的冰箱，所以，宋代人当时就能够在炎炎夏日享受各类清凉解暑的冷饮了。

**第三组：商业都会**

两宋时期，潭州社会相对安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日益发展，商业贸易日趋繁荣，潭州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商业都会.两宋潭州城市聚集和辐射功能的形成为明清时期长沙“江南商埠”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农业方面，宋朝鼓励垦荒，曲辕犁、龙骨车等生产技术的提高，优良稻种占城稻的传入，象牙占等新品种的培育，使湖南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和主要粮食供应基地。

潭州**手工业**也进一步发达，制茶业、茶器、丝织、制墨等都形成一定规模和特色优势，出现了雇佣制手工作坊，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极大加强。

这八副木雕版画，展示的就是诗中所提及的“潇湘八景”，为湖南风景之冠，为历代文人学士所称颂。其中江天暮雪描绘的就是橘子洲白雪江天浑然一色的美景。同时，宋代也是瓷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衡山窑是继长沙窑之后兴起的彩瓷窑，这一组瓷器，都来自于衡山窑，胎体厚重，胎质坚硬。

在中国传统婚嫁礼仪中，新婚“三金”沿袭自宋元时期，**元镂空龙纹心形霞帔金坠**就是“三金”当中的一件**，**双面镂空透雕，整体外形与香囊非常相似，两面中心的主体花纹都是双龙戏珠。霞帔金坠是配套古代女性服饰——霞帔上的一种装饰品，垂于霞帔下端。

两宋的**钱币**制度，也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其中年号钱最多，从北宋“太平通宝”到南宋“淳熙元宝”的300多年里，皇帝改元频繁，共铸造了49种年号钱。

**宋“长命富贵”金钱**是用黄金打制而成，轻薄如纸，中间有方形孔，外缘经过修剪，钱币上有“长命富贵”四字。这个钱币并无面值，专家考证认为是压身钱，放置在墓中为吉利或辟邪的一类物品。

**第四组：湘学中心**

宋代封建科举制度的完备和发展，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潭州书院兴盛，群贤汇集，学术昌盛，人才辈出，成为湖南“湘学中心”和南宋理学基地之一，誉为“潇湘洙泗”。

文化的繁荣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书院的兴起，其中被誉为千年学府、“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位于长沙，是宋代重要的理学宣扬地。976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1015年**宋真宗赐“岳麓书院”匾额**。

另一个就是1161年，由南宋名相、抗金名将张浚、张栻父子在妙高峰兴建城南书院，对宋代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后来，书院因张栻和朱熹的讲学论道而声名远扬。

北宋晚期，潭洲仿太学行“三舍法”，形成潭洲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的官学系统，号称“潭洲三学”。岳麓书院成为潭州的最高学府，在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北宋三次兴学，对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湖南的州、县学普及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以上。

两宋时期，新儒学理学思潮逐渐形成并风靡全国，因学术宗旨及地域学统相异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理学南传后形成的以潭州为中心的地域性流派，传承自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

南宋初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和他的二儿子**胡宏**到湖南隐居，创办碧泉书院。**张栻**为抗金名将张浚之子，二十九岁时拜胡宏为师，主教岳麓书院七年，从学者达数千人，使湖湘学派成为南宋理学大宗，后代学者将其著作合辑为《南轩全集》。他与朱熹讲学论道达两月之久，后世学者称为“**朱张会讲**”，使湖湘学派理学思想更加趋于成熟，影响湖湘文化数百年发展。

随着理学的发展，人们也开始用其思想礼义来规范言行，在清《善化县志》提到“忠孝廉节”四字所包含的孝悌忠信、守节自重、廉洁自律、济世救民等思想被世代传承，现在岳麓书院内就立有此四字碑，大字行书，题款为“晦庵朱子书”，也就是朱熹。

**第六部分：明清府城（明—清）**

**第一单元：藩屏府治**

**“明清府城”**这个展厅主要是展现明清两朝长沙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成就。时间范围大致从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到18世纪末期的嘉庆年间。

**城墙**是一个城市的标志，对于城市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明洪武年

间，长沙守御使邱广将年久失修、毁坏不堪的土夯旧城，改用砖石建筑，经过这次大修，长沙城“城用完固”。经清代咸丰三年大修之后，长沙“城池自是固若金汤矣。” 长沙城墙长一十四里，约8000余米。从这幅**明代长沙府行政区域示意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长沙的规模。

墙上的这段文献，**记载的就是当年邱广主持长沙城改建的情况。**

遗憾的是，民国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长沙城墙被拆除，仅余照片中**天**

**心阁城墙**这一段，长沙城墙至此成为绝唱。

而这些遗留下来的洪武年间的**长沙城墙砖与拓片**，其侧面刻有负责烧造城

砖的官员、职务和姓名。拓片则记载了当时善化县向府城提供城砖，完成修建工作的具体事宜。因此，我们能够推测当时明代长沙的城墙砖应该是由各县和州供应的。

明代长沙城除了完成砖石城墙的历史性改建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奢华的藩王府。朱元璋即位后，鉴于宋元不建藩屏、王室孤立的教训，参照汉晋南朝的制度，大封子弟，分藩就国，建立捍卫王室的宗藩。

先后有潭王、谷王、襄王和吉王及其子孙共4代12位藩王就藩长沙，共计195年，对捍卫王室和加强湖南地区的统治起了一定作用。墙上呈现的是**明代初年藩王分封图**以及**明代历代长沙藩王年表。**下方这个**明代吉藩九龙纽寿山石印，**九条龙的规格与皇帝同级，体现了藩王较高的地位。

除此之外，明代藩王墓葬的出土物品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明代藩王陵园位于现在长沙南边的跳马镇，规模庞大，是目前全国保存较完整的明代藩王陵寝之一。

而此处陈列的吉简王**墓志和墓志铭**，记录的就是在长沙就位时间最长的吉简王的生平，这对于我们研究藩王历史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旁边所展示的墓志和墓志铭，则属于明谷王朱橞的乳母张妙寿。在这里，我要向大家特别介绍的是是这件**石质喇嘛塔**，喇嘛塔又称藏式塔或覆钵式塔，是藏传佛教的特色建筑样式，这种塔在元代开始流行，明清时期继续发展，和喇嘛教在当时的盛行有关。覆钵内部中空，里面有一件木质经箱，内置数十册用金粉书写的道经及佛经，这一特殊现象在目前的考古发掘中比较罕见，是当时佛道合流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些文物对于我们了解明朝早期历史，了解明初政治、社会生活及宗教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湖南地区明代墓葬研究树立了一个标尺。

诸王在封地有统兵之权，无治民之责，同时享有中央提供的各类财政支持，因此，当时的藩王家族在生活方面极尽奢华，最明显的就是修建了拥有八百余间房屋的吉王府。

旁边这个便是吉王府复原模型，其仿故宫而建，位于长沙正中，坐北朝南，东起尚德街与东牌楼街相交处，西到药王街与三泰街相交处，北至中山亭，南到司门口，规模宏大，挥金如土的王族生活历历在目。

当然，除了王府宫殿，藩王府也深刻地影响了长沙城市的建设，至今仍有

很多**长沙老地名像东牌楼、西牌楼、藩城堤、司门口、走马楼**等都留有王府的印

记。司门口是当时仪仗护卫司驻扎的地方，而走马楼的由来则是由于吉王府东边

有一处建筑群，高大宽阔，廊下可以扬鞭策马，因此得名“走马楼”。

“吉府上用”的瓷碗款识表明该瓷器为明藩王家族所使用，巨大的柱础、铺路石印

证了藩王府的宏大。展柜中陈列的龙纹琉璃瓦当和龙纹琉璃滴水也说明当时的藩王的建筑用度较高，以王公贵族自居。

**第二单元：湘省中枢**

明朝后期，政治腐败，灾荒连年，最终于1644年被李自成所灭。长沙是南明王朝抗清的重要基地和主要战场，清顺治八年（1651年），湖南境内抗清斗争基本结束。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乱，长沙成为清军与吴三桂叛军激烈争夺之地。展柜中陈列的这枚吴三桂所铸铁炮，就是当年三藩之乱的物证。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朝平定吴三桂叛乱，长沙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清代是长沙奠定湖南省会城市的重要时期。清康熙三年（1664年）设湖南右布政使司，偏沅巡抚移驻长沙。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诏谕两湖分闱，正式设立湖南布政司。次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湖广行省划分为湖南、湖北两省，湖南正式成为独立行省。长沙成为湖南省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清代长沙交通便利，商贸繁荣，是江南地区的重要商埠，有“湖南熟，天下足”之美誉；文化兴盛，人才辈出，是湖湘文化的中心，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之盛况。

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两湖分治，湖南成为独立行省，管辖洞庭湖以西、以南和南岭以北的地区，成为一个有机的行政整体，长沙也成为湖南省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个多媒体视频中展示就是**战国至清代长沙城市发展演变示意图**。

明朝到清初，由于湖南属湖广布政使司，每逢科考之年，湖南士子必须到武昌赴考，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洞庭湖波涛险恶，致使许多家境贫寒的湖南士子无法赶考。清康熙年间，湖南巡抚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等人多次上疏，请求两湖分闱。闱，是科举时代对考场、试院的称谓，分闱就是指分设考场进行考试。

最终，朝廷于雍正元年（1723）正式诏谕**“两湖分闱”**，此后湖南科举与教育迅速发展，文化昌盛。

同时，清代的长沙在经济上也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城市，农业方面，更是享有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其一，这与清政府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有关；其二，自明代以来，大量的江西移民，为湖南地区的粮食种植，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明代“江西填湖广”迁徙路线图**）；其三，长沙自古“得舟楫之便”，“当七省之冲”,发达的水陆交通,为长沙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文献和水陆交通图**），长沙也成为和九江（江西）、芜湖（安徽）、无锡（江苏）齐名的四大米市

此外，湖南自古为产茶之地，明清两朝茶叶贸易中，以长沙府安化县所产“黑茶”和“红茶”为代表的湖南茶叶，通过官方的“茶马互市”以及商家私人贩运而行销海内外，长沙也是天下闻名的“四大茶市”之一。

稻米和茶叶贸易带动了长沙城的商贸经济发展，清代长沙成为江南的重要商业城市，各类商业经营中产生的诸多老字号品牌，是长沙经济富庶的生动写照。这里的南正街和坡子街两条商业街道上的老行当和老字号复原场景，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的繁华街市。